



于爱华,刘华.全面二孩新政下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黑龙江农业科学,2019(8):134-140.

全面二孩新政下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于爱华,刘 华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且正处于婚育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有助于了解全面二孩新政下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的主导原因。本文以南京市为例,对已经生育一孩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自身基本特征、经济特征和社会融入特征,运用 Probit 模型对新生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二孩的经济负担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进行二孩生育决策中考虑的首要因素,生育的性别偏好、独生属性和家庭的分工模式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最后,从社会保障、妇婴保健、政策宣传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二孩政策;生育意愿;家庭分工;社会融入

我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生育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一人口政策减轻了当时的一些负担,缓解了较为稀缺的资源与人口之间的一系列矛盾。21 世纪以来,人口红利逐渐减少,低的生育率使得社会保障负担加重,老

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问题突出,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国家对生育政策进行适度调整,2013 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到 2016 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下,我国育龄人口在二孩生育方面已经没有政策限制,但总体来看近两年生育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中国目前的总生育率约为 1.2,远低于世界公认的维持人口正常替代水平的 2.1,因此中国也面临着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性^[1]。由于生育行为的不可预见性,想要对生育行为有所预测,了解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效果,研究各人群生育行为的特点,都离不开对生育意愿的研究。

中国是农业大国,国家持续关注农业农村的

收稿日期:2019-03-2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71361140370);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JDA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6YJA790028);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重点项目(2015JDXM011);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第一作者简介:于爱华(1995-),女,在读硕士,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E-mail:aihuayu9512@163.com。

通讯作者:刘华(1979-),女,博士,教授,从事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E-mail:hliu@niau.edu.cn。

Effects of Trace Elements on Seed Setting Rate of *Leymus chinensis*

LIU Ze-dong, CHAI Feng-jiu, GAO Hai-juan, SUN Rui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Branch,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Qiqihar 16100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eed setting rate of *Leymus chinensis* under natural ecological conditions, the effects of boron, manganese, zinc, copper, phosphorus on the seed setting rate of *Leymus chinensis* were studied by applying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spraying times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for *Leymus chinensis* was applying boron fertilizer 3.75 kg·hm⁻² for 10-15 days before returning to green, 30 kg·hm⁻² before returning to green, 75 and 37.5 kg·hm⁻² before returning to green, and 30 kg·hm⁻² at heading stage. Availabl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were 37.5 and 30 kg·hm⁻² at the beginning of flowering.

Keywords: *Leymus chinensis*; seed setting rate; orthogonal test; trace elements; boric acid

发展,同时农民也是“三农”问题关心的重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 年农民工检测报告》中指出,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总数中占比首次过半,已逐渐发展成农民工的主流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 50.5%,比上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 49.5%。新生代农民工是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 80 年代成长和接受教育,于 90 年代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的总称^[2]。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农村居民,他们的观念受到城市居民的影响。但从整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处于较为底层的位置,并未完全融入城市,这种矛盾造就了其特殊性,且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婚育期,其生育意愿会对全面二孩新政下的生育率产生影响,因而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国内学者对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郑真真^[3]通过对不同地区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发现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城乡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差距非常小,仅是生一孩还是二孩的差别,并得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强烈的性别偏好。徐映梅等^[4]加入独生子女家庭这一变量,对湖北省 2 000 多位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得出影响她们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是观念、个人、家庭和政策。风笑天^[5]将“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与“非双独夫妇”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除城市因素外,其他因素均对二胎生育意愿无影响。穆滢潭等^[6]研究了一孩性别、家庭资源等因素对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一胎是男孩则明显降低了妇女生二孩的意愿,此外,城市妇女倾向于根据家庭资源状况进行二孩生育决策。

学界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后的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也进行了研究。廖庆忠等^[7]对全国 12 个大中小地区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他们相较于农村人口对生育数量的偏好较弱,对生男孩的偏好也低于农村人口,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工作和住房对生育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杨菊华^[8]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对流动人口的二孩的生育意愿进行了研究,发现仅有约 15% 的流动人口有二胎生育意愿,单独(一方为独生子女)家庭意愿强

于其他家庭,且家庭对男孩的生育需求是刚性的。田立法等^[9]研究了农村居民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二孩的生育意愿,发现第一胎的性别和年龄以及农民的家庭月收入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大部分进入生育期或已经生育一孩,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已有文献对影响因素的划分较为简单,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研究应充分考虑他们的独特性,分析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时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征、经济特征、社会融入状况考虑在内,有助于剖析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对已婚且育有一孩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问卷调查,试图寻找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的现状,以及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对寻找在放开生育政策条件下生育率较低的原因、对生育政策和相关保障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参考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7 年南京市社会经济调查,该调查针对南京市 4 个农民工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主要问题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意愿、自身基本特征、经济特征以及社会融入特征。实地调研共发放 145 份问卷,经过对数据问卷进行筛选和整理归类,共得到 136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93.79%,本文将基于这些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生育意愿的计量模型分析。

1.2 模型构建

本文因变量设置为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自变量设置根据已有的对二孩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设置了自身基本特征、经济因素和社会融入特征等 3 个方面。自身基本特征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分工模式、一孩性别和夫妻双方独生属性等,在自身基本特征中引入了新的变量——家庭分工模式,探讨家庭内部对于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分配是否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二孩生育方面的选择。经济因素包括:职业类型,收入、流动年限等。社会融入因素包括: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城市定居意愿等。各变量解释和赋值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变量解释与赋值

Table 1 Interpretation and assignment of variables

变量维度	变量解释	变量赋值
Variable dimension	Variable interpretation	Variable assignment
自身特征	性别	女=0,男=1
	年龄	2019-出生年份+1
	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0”,小学“6”,初中“9”,高中或中专“12”,大专“15”,本科“16”,研究生“19”
	一孩性别	女=0,男=1
	独生属性	双非独=1,女独男非=2,男独女非=3,双独=4
经济特征	分工模式	女方工作男方家务=0,男方工作女方家务=1,共同承担家务=2
	职业类型	体力劳动=1,商业服务=2,自主经营=3
	总收入	(元)
	流动年限	(年)
社会融入特征	身份认同	二者皆不=1,农村人=2,城里人=3
	定居意愿	有意愿=1,不确定=2,无意愿=3

为了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明确其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本文选择建立 Probit 二元选择模型,利用收集到的农民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实证分析。

按矩阵形式定义模型为: $Y = X\beta + \mu$, 其中, Y 为观测值为 1 或者 0 的列向量, X 为解释变量观测值矩阵, β 为待估系数, μ 为随机误差项。这时, Probit 模型表示为:

$$Probit(Y_1 = 1 | X_1) = \Phi(X_1, \beta) = \Phi(\beta_0 + \beta_1 \times X_1 + \beta_2 \times X_2 + \beta_3 \times X_3 + \dots + \beta_n \times X_n)$$

其中, $\Phi(\cdot)$ 为标准累计正态分布函数; β_0 为常数项, $\beta_1, \beta_2, \beta_3, \dots, \beta_n$ 为解释变量系数。 Y 则是实际观测到的因变量, 表示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 0 为“无意愿”, 1 为“有意愿”。 X 为实际观测到的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自身基本特征、经济特征和社会融入特征等 11 个变量。

1.3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STATA 14.0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意愿和制约因素

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二孩生育意愿情况, 本文首先对样本进行总体特征分析, 发现在二孩生育意愿方面, 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样本占总样本的 44.85%, 没有生育意愿的样本占总样本的 55.15%, 没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样本较多。

在不想生二孩的原因方面, 有 98.15% 的样本选择了“生养孩子经济负担较重”这个选项, 即几乎全部选择经济原因, 且该原因为首要原因, 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对二孩生育方面的决策首先考虑到生养孩子的成本, 第二个选择较多的原因为“无人照料孩子”, 由于夫妻双方都要工作, 没有照顾孩子的人, 因此影响生育二孩的意愿。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在想生育二孩的原因方面的选择各异, 在“传统观念影响”“两个孩子可以相互照顾”“父母希望再生一个”“想儿女双全”这几个选项上基本均匀分布, 但均未选择“孩子长大工作之后能提高家庭收入”这个选项, 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已经与老一代农村人口的生育观念有了较大差异, 多生孩子为家庭赚更多的收入已不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决策的考虑之内(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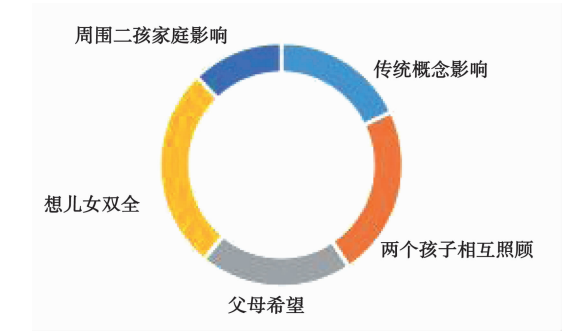


图 1 具有生育意愿家庭的影响因素

Fig.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milies with fertility intention

2.2 变量描述性分析

由表2可知,受访农民工男女分布均匀,各占半数左右,样本的性别分布均匀,说明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所占比例增加,农村人口教育水平和教育意识有所提高,女性人口拥有更加平等的教育机会,对于年轻农村女性来说,外出务工或经商已经不再是男性的专利。

表2 变量描述性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平均值 Average valu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最小值 Minimum	最大值 Maximum
性别	0.5147	0.5016	0	1
年龄	30.3677	3.9624	23	38
受教育程度	10.6177	2.8702	0	16
一孩性别	0.5368	0.5005	0	1
独生属性	1.5185	0.9685	1	4
分工模式	0.7279	0.4467	0	1
职业类型	2.0809	0.7893	1	3
总收入	12901.49	11986.31	2000	70000
流动年限	7.3691	5.3970	0.2	25
身份认同	2.0735	0.6041	1	3
定居意愿	1.6765	0.8334	1	3

在年龄分布上,样本出生年份为1995-1980年,年龄的均值为30周岁,符合已婚且已育一孩的年龄范围。受教育程度的均值在10左右,即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接受了初中教育,这说明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农村人口教育观念的进步,农村人口普遍接受了义务教育,甚至大部分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

独生属性方面,样本均值约为1.5,即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夫妻双方是非独生子女的情况居多,根据80年代国家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符合二孩生育标准的家庭可以申请生育二孩,加上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当时农村家庭多选择生育两个孩子,因此样本与实际生育状况相符。家庭分工模式中,大多数样本的家庭分工模式为男方工作女方负责家务,少部分为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且都有工作,没有出现女方工作男方负责家务的样本。

经济特征方面,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自主经营和商业服务的工作,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农民工比例少于前者,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

选择已经开始转型,他们不单可以选择体力劳动工作,更多的可以选择商业服务和个体经营类工作。

由于收入相对于其他变量属于敏感问题,因此在填报过程中避免出现误报或者故意隐瞒的状况。但在前文对职业类型的分析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大部分为商业服务和个体经营,且从事这两类工作的收入相对较高,因此在收入分析中也较为合理。身份认同上有一部分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归属产生困惑,认为自己两者皆不属于。

2.3 典型变量的生育意愿

为较为全面和直观地了解自变量中二孩生育意愿的数量关系,选择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流动年限和城市定居意愿5个典型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分析(表3)。

表3 典型变量的生育意愿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n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typical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类别 Category	有生育意愿频数	百分比
		Frequency of fertility intention	Percentage/ %
性别	男	32	45.71
	女	27	40.90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35	51.47
	高中、中专及以上	27	39.71
职业类型	体力劳动	12	32.43
	商业服务	25	49.10
	自主经营	24	50.00
流动年限	5年及以下	34	53.13
	6至10年	28	62.22
	11至15年	9	64.29
	16年及以上	4	30.77
定居意愿	定居城市	31	39.74
	不定居城市	10	35.71
	不确定	20	62.50

在性别方面,男性样本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样本占45.71%;女性样本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占40.90%。可以看出在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中,女性的生育意愿略低于男性。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样本数与高中、中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样本

数量相当。在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样本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样本占 51.47%;在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样本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样本占这部分样本的 39.71%。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高的样本中对二孩的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样本。

在工作类型方面,从事体力劳动职业的样本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样本占 32.43%;从事商业服务职业的样本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样本占 49.10%;从事自主经营工作的样本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样本占 50.00%。由此可见,从事商业服务和自主经营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农民工。

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年限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上,流动年限低于 5 年的农民工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占 53.13%,流动年限为 6~10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有二孩生育意愿占 62.22%,流动年限为 11~15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有二孩生育意愿占 64.29%,16 年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二孩生育意愿占 30.77%。可以看出流动年限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具有非常显著的代表性,但

可以看出,流动年限在 6~15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较其他两组高。

在城市定居意愿方面,有城市定居意愿的样本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样本占 39.74%;没有定居意愿的样本中有二孩生育意愿样本占 35.71%;不确定定居意愿的样本中有二孩生育意愿的样本占 62.50%。从数据来看,没有定居城市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意愿最低。

2.4 模型估计

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为因变量,选取自身基本特征、经济特征和社会融入特征为自变量。运用 STATA14.0 软件对样本数据的 11 个变量进行 Probit 模型回归和稳健性回归。

由表 4 可知,一孩的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在 1%水平上差异显著,且一孩性别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为正向,相关系数为-0.244 3,表明一孩为男孩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二孩生育方面的意愿有负向影响,若一孩为男孩,则二孩生育意愿概率降低 0.244 3,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育决策中对男孩的偏好仍然存在,传统的生育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较深。

表 4 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econometric models

变量代号 Variable code	参数估计值 Parameter estimation	实际边际影响 Actual marginal impact	Z 值 Z value	P
性别	0.01665	0.0066	0.06	0.948
年龄	-0.0164	-0.0065	-0.51	0.610
受教育程度	-0.0063	-0.0025	-0.12	0.902
一孩性别	-0.6286	-0.2443	-2.56	0.010***
女独男非	0.5925	0.2321	1.41	0.157
男独女非	-0.5259	-0.1936	-1.26	0.208
双独	-1.1128	-0.3530	-2.02	0.043**
分工模式	-0.4804	-0.1895	-1.67	0.094*
商业服务	0.4040	0.1591	1.18	0.238
自主经营	0.2592	0.1023	0.69	0.489
总月收入	0.00003	0.00001	1.38	0.168
流动年限	0.01948	0.0077	0.74	0.458
二者皆不	0.0149	-0.0103	0.04	0.972
农村人	-0.0262	0.0059	-0.07	0.942
不确定定居	0.5219	-0.0438	1.64	0.101
无定居意愿	-0.1120	0.2058	-0.34	0.736

*** 表示在 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 ** 表示在 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 * 表示在 10%的水平上差异显著。
***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level of 1%, ** at the level of 5%, * at the level of 10%.

夫妻双方的独生属性中,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的样本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影响系数为-0.353 0,说明与“双非独”家庭相比,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二孩的意愿较低,“双独”夫妻相比于“双非独”夫妻二孩生育意愿降低的概率为0.353 0。

家庭的分工模式对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影响系数为-0.189 5,即在对家务的分工模式中,男方负责工作女方负责家务的家庭对二孩的生育意愿高于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的家庭。在第一种类型的家庭中,由于女方本来就担任全职家庭主妇的角色,不需要工作,可能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在孕育和抚养二孩方面比第二类女性更方便,第二类女性由于要兼顾家庭和工作,因此生二孩的意愿低于前者。

在经济特征这一维度,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型、家庭总收入和流动年限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社会融入特征这一维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在身份认同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对其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对二孩生育意愿的边际影响较小,说明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对他们在二孩生育问题上的考虑没有显著的影响,二者之间无明显联系。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较低,表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占44.85%,表示没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占55.15%。新生代农民工对二孩生育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为经济因素,在选择没有生育意愿的样本中,98.15%的样本选择了“生育孩子经济负担较重”这一影响原因,可以看出制约其二孩生育意愿的首要原因是对经济因素的考量。

一孩性别、夫妻独生属性和家庭分工模式是影响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一孩为女孩的家庭更愿意生育二孩,家庭对

男孩的偏好仍然存在。夫妻的独生属性影响他们在生育二孩方面的决定,夫妻双方都是非独生子女的家庭更愿意生两个孩子,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在是否生二孩方面意愿较低。家庭分工模式对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意愿有一定影响,女性为全职家庭主妇的家庭更愿意生育二孩。

在社会融入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定居城市的意愿并不会影响其是否生育二孩的决定。定居城市的意愿这一变量尽管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是在描述性分析时可以看出,没有城市定居意愿的样本的二孩生育意愿最低。

3.2 讨论

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二孩已经没有政策限制,但是对于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普遍提高,仍然考虑多种综合因素,最主要的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费用问题,他们对生育的决策出于对收入和消费的理性思考。因此政府需要完善对流动人口的保障制度,使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有所保障,降低他们生育孩子的成本,体现社会对这部分群体的关注,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生育二孩方面最关注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对生育的性别偏好仍然存在。一孩是女孩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较高,这可能会导致女孩的性别比升高,出现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新生代的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介于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要缓解这一现象,政府应该针对农村流动人口进行现代生育观念的教育,摒弃传统观念中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大力宣传全面二孩政策,通过手机、宣传册、互联网等宣传全面二孩政策,促进农业流动人口对二孩政策的了解。

家庭分工模式可能影响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做全职家庭主妇的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高于有工作且仍要分担家务的女性,对于工作的女性,她们可能出于生育二孩影响工作收入的考虑,对二孩生育意愿相应降低,政府应该完善对婴幼儿

和产妇的卫生保健体系,减少女性对生育二孩影响身体恢复的顾虑。发展婴幼儿照顾和看护事业,为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女性解决生育孩子无人看管的后顾之忧。

3.3 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在人口生育问题方面,不应仅局限于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率的刺激应该着眼于新生代农民工最关心和最顾虑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对二孩生育的意愿才会提高。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对二孩生育决策时,会综合考虑经济负担、成本收益、个人特征、原生家庭环境、工作是否允许等因素。我国应该在完善社会保障政策、降低生养和育儿成本、关注育龄女性健康和女性职业规划以及现代生育观念的推广和教育等方面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 张霞,夏巧娟. 生育意愿与生育率研究进展[J]. 经济动态,2018(12):108-120.

[2]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3] 郑真真.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04(5):75-80,82.
[4] 徐映梅,瞿凌云. 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鄂州、黄石、仙桃市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2011(2):76-84,112.
[5] 风笑天. 生育二胎:“双独夫妇”的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J]. 社会科学,2010(5):58-66.
[6] 穆澄潭,原新. “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 [J]. 人口研究,2018(1):90-103.
[7] 廖庆忠,曹广忠,陶然. 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及其决定因素——来自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 12 城市大样本调查的证据[J]. 人口与发展,2012,18(1):2-12.
[8] 杨菊华. 单独二孩政策下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试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15(1):89-96,128.
[9] 田立法,荣唐华,张馨月,等. “全面二孩”政策下农村居民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天津为例[J]. 人口与发展,2017,23(4):104-112.

Analysis on Fertility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wo-child by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nder New Policy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YU Ai-hua, LIU Hu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become the main part of the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s in the period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Studying the reproductive inten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econd child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main reasons that affect the reproductive inten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econd child under the new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Taking Nanjing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o had given birth to one child, to understand their basic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used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two-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conomic burden of the second child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consider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second child. The sex preference of the second child, the only child attribut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mode of the family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cond child's fertility intention. Finally, we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policy publicity and so on.

Key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wo-child policy; fertility desire;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social integration